

2157007

西乡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西乡县文史资料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八年一月

《西乡县文史资料》第七辑编审人员

审定：李象恭 王正杰

编辑：杨培德 张肇栋

校对：张肇栋

目 录

西乡县农业史话

.....戴长垣 (1)

民国十年以后西乡县粮秣机构的演变和 见闻记事

.....周光复 (19)

西乡县田粮处概况及要事纪述

.....张天新、李锐青、范肇敏 (26)

记我经手东渡乡“运缴公粮”和

“黄金购粮”的经过.....张宗禹 (49)

民国二十一年西乡县设“土地局”的

始末.....杨厚生 (56)

办理土地陈报和土地复查亲历记

.....李子田、文日新 (64)

西乡县城建置史话

.....杨培德 (71)

西乡县古城子历史渊源

——也探“平西城”遗址.....张肇栋 (84)

茶镇沧桑

.....张肇栋 (102)

圣水堰沿革传说暨民国时期修复简记

.....杨景三 (105)

略谈旧衙门的“三班”、“六房”	杨厚生 (109)
抗日时期西安培华女子职业学校	
迁移西乡县的经过	王君毅 (116)
从丰宁书院到西乡二中	罗煜高 (125)
十年风雨满杏坛	
——解放前西乡县中等教育回顾	江弘基 (135)
抗日时期的西乡防空监视队	张肇栋 李践 (146)
为流亡教师尽绵薄——答调查干部谈话录	刘霞举 (151)
在“一战中”求学记事	秦可均 (153)
骆家坝学生自卫队夜袭“国军”	
及其前后	袁贻有 (162)
从城固撤退到巴州投诚的途中纪要	付兴汉 (170)
漫说袁刚之患	张肇栋 (175)
一组链式故实	张肇栋 (201)
缅战纪实	江丹枫 (212)

我服役知识青年军散记

.....岳自秀 (215)

抗战时期西乡县的一次“祀孔”闹剧

.....杨厚生 (224)

封建会道门一贯道

.....周立本 (227)

一个“一贯道”道徒的自白

.....屈子明 (234)

政协陕西省西乡县委员会(含“各代会”)历届主席、副主席、常委、

委员名单及机构设置.....档案局 文史委(240)

质疑 补充 订正

.....朱祥远 张肇栋(259)

编后记

.....文史委 (261)

※补白※

西乡民俗集·义赠灯笼、草鞋

.....张肇栋 (18)

西乡民俗集·指路碑

.....张肇栋 (100)

锦联绝对

.....张肇栋 (104)

小典故·此“旗杆”非彼旗杆

.....张肇栋 (108)

西乡民俗集·寡妇再嫁

.....张肇栋 (115)

西乡民俗集·盛夏凉茶

.....张肇栋 (124)

轶事钩沉·放“胜利炮”

.....杨厚生 (134)

讽改贪官春联

.....张肇栋 (145)

轶事钩沉·联对揭时弊

.....杨厚生 (152)

轶事钩沉·天道、人道

.....杨厚生 (169)

轶事钩沉·歇后语“二里桥的百姓

——好百姓”的来历.....杨厚生 (174)

西乡民俗集·夜哭郎

.....张肇栋 (214)

西乡县农业史话

戴长垣 供稿

一 历史陈迹的追溯

西乡县远于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11年）始建南乡县，迄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的独立行政历史。最早活动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披荆斩棘，开辟草莱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据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汉中考古工作队于1958年在本县西南牧马河南岸大歇场东麓第一台地李家坝发掘的“李家村文化遗址”，以及后来几处出土文物可以证明七千年前，先民已由渔猎转向定居；从遗物中的石铲、石斧、凿、锄、杵等实物看，已经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生产活动。

从西汉到南宋，这一千多年间，西乡农业有三次较大的发展：一是楚汉相争之初，汉王刘邦立国汉中时，曾大力提倡农垦，丰富军用，以进取关中。《水经注》载：“洋川者，汉戚夫人之所生处也。高祖得而宠之，夫人思慕本乡，追求洋川米，帝

为驿致长安……”。洋川者、即今之水东坝一带，这证明了两千年前西乡的水东坝一带已盛产优质大米。二是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北伐曹魏，驻军汉中，“分兵屯田，兴修水利，使民积谷”，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三是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抗金名将吴玠、吴玠、杨政、杨填等驻兵汉中、安康一带，提倡军垦，曾恢复和兴修十万亩农田和水利工程。这三次发展，西乡农业得以奠定了坚实基础。

唐宋以降，由于政治上的相对稳定，西乡农业经济日趋发达，多种经营也较发展，如唐宋时期的茶叶，元、明时期的桐油、生漆、木耳等，已在国内享有盛名。足见经过先民胼手胝足的惨淡经营，已把西乡这块土地，逐渐建成了美丽富饶的鱼米之乡。

明清两代，西乡农业发展很不稳定。主要原因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农业生产，是统治者赖以生存的经济命脉，养官、养民、治军、治政，无不仰息于农业。而以农为业的农民，便是受剥削的主要对象。农民胼手胝足，终年“面朝黄土背朝天”，受尽磨难，在生产条件极为低下的社会里，农民本来生活面临冻饿之危，还要受统治者极其严重的地亩之税，丁役之苦，弄得家破人亡，田地荒芜，走投无

路，只有冒死“造反”，农民发动起义。据我县有史可查的天灾人祸有下列事实：明末崇祯年间，由于政治腐败，搜刮无度，“陕西大饥”，民不堪命。闯王李自成部，曾三次转战于西乡，使我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的破坏。继而清顺治五年（1648）川民杨三揭竿而起，数万之众扰乱西乡。康熙十三年（1674）吴三桂叛变于云南，部将谭宏占据西乡长达五年。其时“道路饥殍，剥削殆尽”。从明末到清初，短短的数十年间，西乡农业连遭兵、旱、风、蝗等患，“民死于锋镝、饥馑、瘟疫者十之五六”，“人口较盛时不及十分之二三……十室九空矣”。（引自薛著《西乡县志》）。人口大量逃亡，土地大片荒芜，农业生产濒于停顿。因而清廷统治者由顺治七年至康熙二十七年，先后两次颁《垦荒诏》，豁免汉中府县之赋税，但终未能缓解民困，只不过是扬汤止沸。迨至康熙五十年后，虽兵患少戢，地方粗安，而因损失过重，元气难复，本县还是“荒榛茂草遍城下，虎狼夜食鸡犬，居民不能息也”的荒凉局面。乡间不少地方仍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虎患犹多，人烟稀少所种者十之一二的悲惨景象。康熙五十一年（1712），西乡知县王穆，目睹这“有官无民可治；有地无赋可征”的局面，组织猎户团打虎，以安闾阎。三年中猎虎竟达六十四

隻。今西门外尚有“射虎亭”之遗址，树有石碣（现在文化馆）以志其事。当时“县城脚下”，尚是如此，其他较远地区，更是可想而知的。呈请川陕总督，转奏朝廷，敕准招徕移垦民荒。于是王穆设“招徕馆”，以接待湖广、粤桂、江左等省移居来县的客民。制订优待规定，给以种种便利，发耕牛，散籽种，允许客民在无主田地插签为界，开垦营殖，土地归为已有。这一政策对少地无地的农民来说，吸引力很大，因此“人稀地荒”之西乡农业得以复苏。又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太平之世，地方宁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在这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由于各省客民的播迁定居，基本上改变了土地荒芜，人口萧疏的局面，使社会结构和农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些“客民”风餐露宿，受尽辛苦，甚至“以妻为犊，以背为车”，他们把荒山开成熟地；依山傍水开作堰渠，因地制宜，广辟水田，既而逐渐扩大到边远山区，使这些不毛之地，也成了人烟集聚的粮食产地。客民们还带来了东南各地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调整了粮食产品结构，除大面积的种植水稻外，还在山坡地推广玉米、小麦交替轮作，改变了山区人民的主食。《汉中府志》载，“数十年前，山区秋收以粟谷为大茬。粟利不如包谷。近日（指清嘉庆年间——编者注）满山遍野皆包谷

……其利甚大。蒸馍、作饭、酿酒、饲畜，均取于此，与大小二麦之用相当……他们还充分利用地力，广种杂粮粟谷、黄豆、小豆、苦荞、洋芋等作物，改变了单一的种植局面，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是我县农业史上的一大跃进。由于人口增长，劳动力充裕，粮食自给有余，刺激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桑蚕、茶叶、苧麻、生漆、桐油、木耳、药材等多种经营和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凡此，都与王穆所招徕的客民的勤劳勇敢，分离不开，其贡献是巨大的。

降至嘉庆年间（1796—1820）由于搜刮日甚，民不聊生，嘉庆二年（1797）白莲教起义于湖广，转战陕南，时进时退，清军围剿长达九年，本县农业又遭破坏。同治元年（1862）云南农民起义军蓝大顺冲杀入陕，是年五月中旬，火攻西乡，城崩陷落，军民死难者达万余人。同治二年太平军扶王陈得才攻占西乡，连营二百余里。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人民逃亡，田地荒芜；无论官兵、义军的给养，均取之于县境农民，于是形成了“老弱饥死沟壑，青壮流为盗贼”的悲惨局面。先民辛辛苦苦惨淡经营一百多年发展起来的成果，又付之一炬，农业生产又一次受到极大的破坏。及至同治、光绪之世，列强入侵，接踵而来。本县地处西北僻壤，虽

有政府的无穷科征，而地方却也宁静，因此，本地人民暂有喘息，从事恢复生产。但土地兼并之风大盛，豪绅、巨贾却以各种手段，残酷剥削，兼并土地。耕者无田，只能向地主们租佃土地耕种，交租殆尽，常年在饥饿线上挣扎。

1911年，武昌首义后，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政体，建立了中华民国。但这个“民国”的新政权，又为北洋军阀的头目袁世凯所窃据。袁阴谋恢复帝制，倒行逆施，背民叛国。所谓“立新法，倡民权，兴农业，除弊政”的新政，只不过是一句空话。袁氏失败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对人民的横征暴敛，较明清之世有过之而无不及。民国七年（1918）四川军阀刘存厚，攻占汉中，搜刮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民国十年（1921）陕西督军陈树藩退却时过境，征粮征伕，闾阎为墟。接着北洋军阀吴新田盘据汉中，更是极尽搜刮之能事，征收田粮地丁银子时，各种附加超过原额数倍，农民不堪负荷，农业更见凋敝。加之，民国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七年、十八年连遭大旱、水涝、虫病等灾害。尤其是民国十八年（1929）赤地千里，颗粒不收，草根树皮，挖削殆尽，饿殍载道，死亡相藉。加之次年八月，牛匪填樁，由紫阳边境卷土重来，攻占西乡，滥施暴虐，强勒硬索，什么“指

名派款”、“指粮借款”，纷至沓来。派“委员”下乡催逼，农民无钱缴纳，被鞭打绳拴者，络绎于道。县府大堂，每夜都在用刑逼款，悲嚎哀苦之声，达于通衢。牛匪又串通邻境土匪，群集西乡，被人民称为“十八路诸侯闹西乡”，一时群魔云集，闹的乌烟瘴气。卒至工商停业，学校停课，农村则民逃田荒，凄惨之象，不忍卒书。其后，虽祸乱稍息，但苛捐杂派，有增无减，民国二十年（1931）九种地方费，全县计征十万银元，二十一年突增至五十万零九千九百廿一元，加上军费及地方费二十二万元，共计七十二万九千九百二十一元。以全县人口平均，每人须负担五元以上，（当时大米每斗一元二角）。款连款，税接税，旧欠未了，新派又到，名派一万，实纳过倍，限期紧迫，急如星火，真可谓“竭泽而渔”。农民终年辛苦之所得，难纳百端之苛索，只得倾家荡产，卖儿鬻女，且随时可以琅琅入狱，因此不少人将田地契约张贴于门墙，弃家逃亡。真是“云愁一邑，雨泣万家”，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生产又一次遭到巨大破坏。

民国二十一年（1932）当时政府为了“缓解民困”，曾专设立“西乡县土地局”，将荒芜之田五万余亩，由土地局出面招佃耕种，并号召原田主归耕，且给以种种优惠，农业才得以复苏。民国三十

一年（1942）先后成立了“西乡县农业推广所”，“西乡县中心农场”等机构，以增产粮棉，推广示范，繁殖良种，防治农田病虫害及畜疫为内容，用举办“农业讲习会”等形式，进行宣传。此年即以贷款形式，分配给县“四号斯字”和“德字”棉种，在葛石、十里、东渡等乡试种一千余亩，每亩以二十元贷款扶持棉农。翌年陕西省棉产改进所分配县植棉任务为一万九千亩。在贷款支援和皮棉加价的吸引下，全县农民种棉面积达二万七千七百亩。同年，粮种方面，又由南郑农业推广所引进“金大九四六”水稻种六百斤，在沙河、十里、东渡等乡试种，当年即得增产效益。民国三十二年（1943）又引进六百斤“金大”和“白麻粘”良种，普及于贯山、柳树、杨河等乡。三十五年（1946）陕西省农业所分配给县“金大2905”二十石（折合5600市斤）在葛石、十里、杨河、沙河等乡推广种植。至三十五年（1946）全县水稻播种面积共计十二万五千五百九十多亩，使用良种占20%以上。为了增产，政府还发动农民将传统糯稻改种粳稻，使粳稻种植扩大五千余亩。并大力提倡旱地作物，减少冬闲地，扩大种植面积，于是形成了我县农业品种革新。另外，在农业技术方面，也有所提倡，国民政府曾明令将二月五日农民节，改为四月清明节时的“劝农会”。民国三十一

年（1942）成立“西乡县农会”，各乡镇成立分会，还建立了“农林场”、“农业推广所”。县农会在十里、东渡、堰口等乡（镇）建立示范农场，作好农业科技的宣传，印刷《粮棉增产实施大纲》、《防治农田病虫害办法》等宣传品。民国三十五年（1946）四月，还利用清明骡马大会，在县城南河坝组织“劝农讲习展览会”，下设劝农讲习处、农业展览处、耕牛评比处，分别宣传农业知识技术、及农产品标本、耕牛饲养、牲畜疫病等，为我县农业技术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可惜这些举措只是昙花一现，此后由于无人关注扶持，便成为有名无实的虚设机构。

在农副产品方面，民国三十三年（1944）西乡县政府以西乡四境多山，柞林约有五百余万亩，且山势舒缓，倾斜平均在25度，放养柞蚕，最为适宜。经县政府报省建设厅批准，在马踪滩和茶渔乡建立了两个柞蚕厂，放养柞蚕，从改善农业经济，利用山地资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项“善举”。但因领导不够重视，管理不善，又缺乏技术等原因，放养三年，经济效益不佳，乃以失败告终。同时也在城西牛头山、城南之官屯山，广植油桐；在山区发展茶叶、木耳等山货，虽无显著成绩，可对后来的发展多种经营，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取得了一定

的经验。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弊政繁多，文贪武污，非法掠夺，奸商刁贾，囤积居奇，造成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紊乱。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一日数变，人民受尽了战争带来的种种灾难。尤其是受剥削最重的农民，既负军粮民食的供应之责，又受拉兵拉伕的徭役之苦，长期挣扎在饥饿死亡线上。国民政府颁布的《兵役法》条规，也无形废止，变征兵为拉兵，有权有势者，虽有数子，却不应征；贫苦农民，虽系独子，亦难幸免，常被保甲长强行拿送，绳捆索绑，无异囚犯。入营后被官长克扣，缺衣少食，疫病流行，死亡相继。农民中精壮者或抛妻离子，远遁他乡；或昼伏夜出，露宿山林；或为逃避兵役，自截手指，甘成残废。于是农村劳动力锐减，生产依赖妇孺老弱，产量下降，极不景气。加上虎官狼吏，横征暴敛，地主恶霸，乘机兼并。好不容易磨到抗战胜利，国民党政府又发动内战，不但课征加重，而且拉兵加强，使农民更趋于破产，广大农民嗷嗷待哺。在民族矛盾解决之后，又出现了最尖锐的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都盼全国解放，以解斯民于倒悬。1949年12月5日，西乡解放，历史又开新页，农业情况，土地政策，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